中國報人的「報國情」與「報國路」 ——評《文人論政》與《報人報國》

吳廷俊、於淵淵*

書名：文人論政：知識份子與報刊；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

作者：李金銓主編

出版日期：2008年；2013年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壹、前言

《文人論政——知識份子與報刊》和《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以下分別簡稱《文人論政》和《報人報國》）兩本論文集，作為2007年和2009年兩屆「中國近現代報刊的自由理念與實踐」學術研討會的成果，由香港城市大學客座教授李金銓先生編集而成。分別於2008年和2013年，由臺灣政治大學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¹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在新聞傳播學界引起強烈迴響。

投稿日期：102年9月9日；通過日期：103年2月15日。

* 吳廷俊為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e-mail: tjwu@mail.hust.edu.cn；於淵淵為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博士候選人 e-mail:ym96130@163.com。

李金銓先生坦言，他之所以連續在香港城市大學召集眾學者召開這樣的學術會議，主要源自對華文學術界新聞史寫作不怎麼滿意。在他看來，一方面新聞史的很多著述多為平鋪直敘、像流水帳，缺乏問題意識，沒有太大的解釋力；另一方面，這些作品在談到具體歷史人物的時候又有太多道德判斷和政治褒貶（李金銓、田波瀾，2013 年 8 月 7 日）。因此，他把在美國舉辦學術會議、搭建學術交流平臺的模式「移植」到香港，先議定明確的主題，提供指引，再邀請名家分別撰文，後在研討會中發表、評議、討論之後進行修改，再結集出版（李金銓、燕舞，2013 年 11 月 4 日），旨在為中國新聞史研究引入多樣的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這就是如上兩書的由來。

李金銓先生為兩本書均作了詳細的導讀，在總結評介全書的論文之外，意在將討論提到一個更大的構架中。李先生認為，百年以降，中國報刊的主要角色是救亡圖存，其三部曲是啟蒙、革命與追求現代化。這些角色結合了中國士大夫傳統及現代知識份子精神，形成一種鮮明的「文人論政」風格（李金銓，2008，頁 1）。

由此，《文人論政》一書旨在捕捉近代中國報刊「文人論政」的特色，並考察其成就與限制。李金銓先生為《文人論政》的續篇命名為《報人報國》，他告訴讀者，此名取自成舍我生前在臺北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學生畢業紀念冊的題詞，李先生認為「報人報國」四個字真實地反映了上幾代中國報人念茲在茲的抱負與情懷（李金銓，2013a，頁 36）。後一本書旨在探討在近現代中國（尤其是民國時期）的報刊環境中，「報人報國」的「國家想像」如何落實或落空？在「文人論政」的歷史脈絡下，自由主義如何獲得理解（李金銓，2013a，頁 3）？

《報人報國》的代序明確言及《報人報國》是《文人論政》的續篇。在我們看來，這裡的「續」更多的表現為兩本論文集出爐時間序列

上的先與後。²事實上，這兩本書在問題關懷上是一以貫之的。《報人報國》與《文人論政》，所關涉的是中國報人的「報國情」與「報國路」。「報國情」與「報國路」這兩個關鍵詞，形構了一個緊密關聯的主題，不僅僅將兩部書聯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也表徵著中國近代新聞史的核心義理。

貳、中國新聞史的核心意理

中國近代報刊史中的「報人」，在最寬泛的意義上被使用，不囿於職業角色。在中國追求現代化過程中，文士、學者和報人往往角色交叉混雜，文士、學者在報刊論政或兼職或報人在大學教書，都非常普遍（李金銓，2013a，頁 1）。儘管中國報人在 20 世紀 20-30 年代，開始了職業意義的轉向，但如有學者所稱，在中國現代新聞業中，無論是「職業化」的報刊實踐還是「職業化」的報刊思想，都不是也沒有成為我國報刊和報刊思想的主流（黃旦，2000）。中國記者一向自詡為知識份子，秉承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不甘做單純的專業新聞記者。中國報紙與政治又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所以他們一生所做的，有的屬於記者分內事，有的超出記者的職責，而遊弋於政治黨派邊上，這是和西方專業記者迥然異趣的（李金銓，2013b，頁 405）。因此，對於生成於特定中國歷史文化背景中的中國報人，絕對無法、也不應該用移植現代西方（尤其是美國）的「職業邏輯」去界定、去理解，去觀照。

在余英時（2004，頁 11-14）先生看來，中國知識人自始便以超世間的精神來過問世間的事。換句話說，他們要用「道」來「改變世界」，「救世」、「經世」都是「改變世界」的事。這一精神上起先秦下及清代，始終貫穿在中國知識人的傳統之中。³ 1905 年科舉廢除之

後，中國知識人藉讀書、考試以完成社會學意義上的「晉升」通道被屏蔽，讀書人的上升性變動取向從根本上改變，士的社會來源被切斷，新教育制度培養出的已是社會上「自由浮動」的現代知識份子（羅志田，2005，頁 128）。

科舉制度的廢除作為一段歷史的終結，也促使中國讀書人尋找新的角色安排。以報章、學校、學會等為載體的建制的確立，預示著讀書人獲得了有別於「士」的新角色與身份。但是身份的轉化背後，一以貫之的是中國知識人面對「國家」的心態。

「國家」是一個政治概念，以權力為其核心。與之相關，「民族」則基本上是一個種族與文化的概念，以共同祖先、語言、生活方式、精神傳統等為其主要內容。以中國觀念而言，文化尤重於民族，無論是「天下」還是「中國」，在古代都是具有涵蓋性的文化概念，超越了單純的政治與種族界線（余英時，2006，頁 294）。

19 世紀末以來，中國開始了自身的近代轉向，成為世界叢中的一員。國人也逐漸在政治性的「民族國家」維度中建構中國觀念，這也是中國現代國家觀念萌生的背景。⁴ 以西方近代史的主流而言，國家觀念無法脫離民主與憲法而存在，至少在理論上，現代國家的主權是屬於全民的（余英時，2006，頁 297）。而在晚清士人引入政治性的「民權」概念時，他們是在中國傳統「民本」思想中來解讀民權，相對於西方個人意義上的民權，晚清中國的民權是以「整體」和「集體」的面貌出現。西方「話語資源」的援引，被附著於傳統思想文化的「先結構」之中。黃克武先生曾言：中國民主思想的主要觀念均採借自西方，中國的思想家在採借的過程中加入了主觀的詮釋，將這些源於西方的想法與中國傳統的一些預設結合在一起，造成了思想脈絡的根本變遷（黃克武，2013，頁 40）。⁵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葛兆光（2011，頁 35）先生並不建議用簡單的民族國家視角去看待中國。在他看來，「中國」尤其是漢族中國的形成，在宋代以後就開始了，這一歷史似不宜用歐洲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歷史為基準或尺度簡單理解。⁶ 所以，他提議當務之急不是「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而是在「歷史中理解民族國家」，即在中國歷史脈絡中理解歷史中國（頁 34）。討論在中國歷史脈絡中去理解歷史中國，是承認近代民族國家從傳統的帝國中蛻變過來的「現代轉向」，也同時提示我們注意這種現代轉向中所附著的傳統中央帝國的痕跡和延續性。這種痕跡和延續性，呈現的是「中國」色彩。

由傳統中國讀書人轉型而來的中國報人對於中國的情感，正是建立在這種對於「中國」意義的理解之上。一方面，他們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天演」、「進化」的思想脈絡中，秉承對西方現代文明的無限信仰，希望藉對西方民主觀念的「學習」和「借鑒」，暢想中國作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屹立於二十世紀天演之大舞臺；另一方面，中國報人最初與報紙的關聯，皆由政治而起。⁷ 他們在「上下通」、「內外通」的意義維度中，建構個人與國事的勾連。

中國報人對於國事的參與感，來自儒家「菁英分子」的使命感。⁸ 這種菁英讀書人，被艾爾曼（Elman, 2000；轉引自 Kuhn, 1999／陳兼、陳之宏譯，2013，頁 14-16）稱為「通曉經典的文人」（classically literate），他們所受的教育，是閱讀、解釋、甚至背誦將在科舉考試中使用的經典文本；他們的這種誦讀詩書的經歷，受到了文人學士應當以「以天下為己任」的教育。科舉考試又通過以國家大事為題，除此之外還包括「策論」，而使得文人們心目中「以天下為己任」的信念一再被強化。⁹

這種信念與責任感往往被中國近代報人外化為一種對於「公心」的

秉持。英斂之把「公」字直接置於報刊的命名之中（英斂之，1902 年 6 月 17 日）；狄楚青在《時報·發刊例》中，將辦報原則定為：「公」、「要」、「周」、「適」，紀事之「博」、「速」、「確」、「直」、「正」（時報發刊詞，1904 年 6 月 12 日）；梁啟超在《國風報》創刊號上闡述了辦報的「五本」、「八德」，其「五本」之一即「公心」（梁啟超，1979，頁 570）；胡適等人在辦報歷程之中，提出「公」的理想——講公道話、做公正人，其所秉持的是為「公家」幹事的心態（章清，2004，頁 458）。

這種「公心」的秉持因與國是的緊密勾連，從而擁有了道德上的正當性和道義上的絕對優先性。正是如上的「報國」情愫，恰恰構成了中國報人投身報業的基本心理起點，也成為「報人報國」情懷的基本邏輯起點。如果說，傳統紳士的菁英身份更多體現於擁有政治參與的特權，而在中國知識份子走向「邊緣化」之後，其菁英身份的取得更多在於對文化空間的掌控，以及藉以言論干預政治的希冀。

在晚清政論的這種蔓延之勢中，從維新報人到風起雲湧的革命報紙言論，無不都在「國」的名義下亟亟言說。由關注國事而進入報刊，發言論事，隸屬於晚清報人辦報的「眾生相」。在這種「眾生相」背後所延續的是傳統清議裡中國士子期以言論干預政治，利於國事的情懷。

如果說這種希冀與責任隸屬於「道」，「文人論政」作為「報國路」的一種則可被歸位於「器」的層面。中國近代中文報業經歷了從宗教月刊時期到「新報」萌芽與成長期的過渡（卓南生，2002，頁 205）。傳教士創辦的報刊重在闡明宗教教義，宣揚西方文明，提供新聞與貿易行情。這些傳播管道在許多方面仍有許多開創性的影響力，而受其影響的對象往往是社會階層中的邊緣人（李仁淵，2005，頁 38）。在香港和上海創辦的新報則以報導商情為主，其實際影響力亦局

限在一個比較小的範圍。在《循環日報》中，王韜將上書建言這種傳統參與政治的方式轉化為與現代報刊上的政論文章，開創了儒家知識份子與現代報刊結合的嘗試（邵志擇，2012，頁 86-87）。

王韜曾有如下評述：泰西日報「今日雲蒸霞蔚，持論蜂起，無一不為庶人之清議，其立論一秉公平，其居心務期誠正」，如英國的《泰晤士報》，「人仰之幾如泰山北斗，國家有大事，皆視其所言以為準則，蓋主筆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趨向也」（王韜，1999，頁 14）。正如章清先生所言，這裡所謂的「庶人之清議」，緊扣的正是士大夫所熟悉的職能（章清，2013，頁 469）。

國人在自辦報刊的初始和演進中，皆以「清議」的思維框架去認識和理解報刊。與《時務報》遙相呼應的《知新報》在發刊詞的敘述中言道：「嘉慶以來，創始為報館，名曰新聞，從風披扇，文章並述，政俗攸存，小之可觀物價，瑣之可見士風。清議流傳，補鄉校之未備，見聞通窮字內之大觀」（吳恒煒，1979，頁 269）。在《大公報》創辦的最初幾年之中，以英斂之為代表的《大公報》人亦是以擔負清議為己任，是謂：「願吾輩清議中人，立智育之根本，定德育之方針，勿因阻力而生怠心，亟出愛力，而維國運」（嚴設報律問題，1902 年 11 月 15 日）。「以當清議重任，喚起特別之精神」（答某新聞記者論報務，1903 年 2 月 11 日），不僅僅成為他們對「本館報人」的自我規定，也成為對「彼輩」報人所寄予的深切希望。《東方雜誌》中《論中國書報不能發達之故》一文將輿論與清議並置：「夫新聞為輿論之母，清議所從出，左挈國民，右督政府。有利於社會者則鼓吹之，有害於社會者則糾正之；社會所疑，昭而析之；社會隔閡，溝而通之；有所褒，則社會榮之；有所貶，則社會羞之。此新聞紙之良知良能也」（鶴穀，1905 年 2 月 28 日）。由此不難看出，現代報刊在他們心目之中更多具有的

依然是指陳時弊的意義。

李仁淵（2007，頁 45）在討論晚清的言論空間時也說：「中國知識份子試圖用中國傳統思想資源去解釋、理解西洋思想，例如以清議的傳統去理解言論自由，一方面是為了合理化接受西洋思想資源的舉動，一方面也利用原有的思想資源，對西洋思想揀選，以轉化成中國可以接受的方式」。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借用了西方輿論政治「監督政府」、「言論自由」、「第四種權力」作為話語資源，卻依然具有「格義」方式的諸種想像。這種報刊思想，觀念的「移植」，也是劉禾（2008，頁 3）所言，某種意義上的「跨語際實踐」。

葛兆光先生重新肅清對於「中國」概念的理解，強調在歷史中認識中國，其背後的關懷更在於究竟如何在一種內在的脈絡中，去理解「中國」這個迥異於西方的國族。溝口雄三先生提出「基體」論，他將中國的近代過程比喻為蟒蛇的蛻皮過程，它改變了蟒蛇的面貌，卻不能說蟒蛇不再是蟒蛇（溝口雄三，1989／孫歌，2011，頁 294）。「基體論」歸根結柢認為，每個國家都有其獨自的歷史現實和歷史展開，這體現於長期持續的種種現象在不同時代裡的緩慢變化。所以，他提醒如果要把握中國的近代，則應該從近代與前近代的關聯來把握（溝口雄三，1989／孫軍悅譯，2011，頁 111）。

對於如何把握中國近代報刊史演進的「基體」？如何在這一演進的「基體」中，去重現特殊的時間與空間中，報刊理念、報人對於國家的想像之複雜性？《文人論政》與《報人報國》二書給出了很好的回答。中國近現代報刊的主流是「文人論政」的報國情懷，這也構成了中國報刊的基本特色之一。近代中國知識群體在邊緣化的過程中，以進入報刊的方式，重構社會與文化的重心（李金銓，2013a，頁 34）。正如一首樂曲往往由主旋律和變奏組成一樣，中國近代報刊史的主旋律就在於心

懷報國之情的中國職業報人抑或非職業報人，通過創辦報刊，以言論政，以言報國。這是中國新聞史的沉痛之所在，也是中國新聞史的精髓之所在。讀懂了這一點，就讀懂了中國新聞史。

李金銓先生所編的這兩本書《文人論政》和《報人報國》探討了中國報人的「報國情」與「報國路」，隱現了中國近代報刊史敘述背後深層的「問題關懷」，即如何認識、理解與把握中國近代報刊史的「基體」。從這個意義上，這兩本書不僅僅應該被稱作「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而且是中國新聞史最應該有的「讀法」。

參、視野和方法的啟示與範例

如果說《文人論政》與《報人報國》可以被視為中國報刊史的核心義理，建構的是「同」，提供的是歷史的縱深感；這兩本論文集於此之外的另一個層面意義，旨在於從視野和方法論角度提供啟示和範例，努力回到歷史現場，建構「異」與「複雜性」。

1. 問題與視野

史料對於新聞史研究的意義不言而喻。然而，歷史意義的揭示與彰顯更在於建立史料之間的內在邏輯。這種歷史材料之間內在邏輯的建立，需要借助於「問題」來牽引。問題意識能夠提綱挈領，把林林總總的史料串聯起來，使歷史材料新鮮生動起來，既看到內在邏輯，又彰顯背後一層層的意義（李金銓，2009）。因此，問題的設立直接關乎論文的主旨以及論文可能觸及的面相，而問題的提出則與研究者所居的研究視野有密切關聯。此二書的作者來自史學、社會學、傳播學諸領域，書

中的論文探討新聞史的研究對象，卻因新視野的納入，所燭照的問題往往是傳統新聞史研究極少涉及的。

舉例而言，〈密蘇里新聞教育模式在現代中國的移植——兼論帝國使命：美國實用主義與中國現代化〉（張詠、李金銓，2008）一文的核心關切在於密蘇里新聞教育模式在中國現代新聞教育中的「移植」問題。圍繞這一核心，作者環環相扣設置問題：執中國之牛耳的北京大學為什麼在十年之內擁抱並不被美國菁英大學所看重的密蘇里新聞模式？美國新聞教育的精神是什麼，以致中國知識領袖認為新聞是現代化的一部分？密蘇里新聞教育模式何以迅速征服全中國？作為學界翹楚，哥倫比亞模式何以不能像密蘇里那樣在中國產生絕大影響？

針對這些問題，作者進行了綿密入裡的分析：北京大學的領導者之所以積極提倡新聞教育，是將其視作中國追求現代化的一個有機部分；而美國新聞教育的核心精神——實用主義——強調如何解決實際問題，注重實效，與中國追求現代化的場景悄然勾連，成為中國大學歡迎密蘇里模式的一個內在誘因。而且，密蘇里新聞教育提供了一個可以借鑒的範式，其講求實效的改革精神，切中了中國的時弊，而且密蘇里強調的動手做、在做中學的技術容易照搬到中國。此外，密蘇里新聞學院院長來華五次，多處演講，並帶中國學生去密蘇里留學，這些學生歸國後紛紛在各校成立新聞系，均成為密蘇里的翻版。正是在這樣一系列問題的牽引與回答中，論文在新聞教育模式的「移植」之外，關涉西方列強在中國的競爭、美國的擴張主義，及在中國日漸增長的政治經濟利益，以及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問題。

對於如何借用其它學科的視野來關照新聞史的問題，此二書的論文給出了可供借鑒的範例。在兩本書的最後，編者總共列舉了 41 個題目，其中有類似、有交叉更有延伸與生發，為青年學者提供了進一步思

考的「探照燈」式的牽引和啟示。李金銓先生言及，這些題目主要基於跨學科的視野，希望藉此增加分析的厚度，看到傳統新聞史看不到的地方（李金銓、燕舞，2013年8月7日）。

2. 文本與脈絡

新聞史研究關注的主體向來是重要的報刊及報人。以往的研究多聚焦於辦報者對於報紙的創辦歷程的描述，以及報紙的內容本身，所依據的證據材料亦多取自報者在報章上所發表的文字。如果說報章上的文本可以提供「是什麼」的回答，作為語境與脈絡的歷史文本則可以更進一步說明解析「為什麼」的問題。

對此，李金銓先生言及：「除了文本（text）分析，我們必須看到『人』的活動，瞭解傳播者（報刊及其主筆）和受眾如何透過文本（內容）而產生什麼互動（思想變化、行動、效果、影響）。因此，分析者必須旁敲側擊，把文本回歸到歷史語境（context），並且聯繫當時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李金銓，2013a，頁32）。

《報人報國》中楊奎松教授所撰寫《新中國新聞報刊統制機制的形成經過——以建國前後王芸生的「投降」與〈大公報〉改造為例》一文（楊奎松，2013），通過建國前後中共利用統戰政策促進王芸生改變政治立場，進而通過王對在中國新聞行業中影響最大的私營報刊《大公報》成功改造的案例，對新政權改造舊報舊刊的方法和情形，做歷史性的考查與剖析。論文展示了《大公報》在時代轉型期間一波三折的命運起伏，探討了新中國新聞報刊統制的形成經過以及中共如何對私營報紙加以改造、控制、利用的歷程。

作者通過對綿密的檔案材料和回憶類、傳記類資料的編織，展示了

新政權改造舊報舊刊的過程，重點透視了作為鮮活的大公報人代表的王芸生的心路歷程，他的性格、才氣、交往，特定時間與空間中的糾結、抗爭、無奈、焦灼都在文章中鮮活地被展現。除此之外，論文也勾勒了《大公報》社內部人員之間的相互影響、刺激、關聯，並緊密勾連了新聞政策，以及政策背後的當政者的政治意圖的邏輯關係，為我們展示了新政權破舊立新，成功施行新聞統制政策的曲折的經過與複雜的歷史場景。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編者認為只有將內證（文本的理路）與外證（語境和脈絡的聯繫）交叉配合（李金銓，2013a，頁 33），才可以更有效的還原歷史、逼近曲折、複雜、具體、矛盾的「歷史真相」。

3. 小切口與大情懷

此二書共有 26 篇文章，個案研究佔據大半。雖然這些個案研究的切入角度都相對微觀，但所最終關涉的皆是大情懷，使得這些研究得以出入「微觀與宏觀之間」。

例如，高力克先生以哥大四傑胡適、徐志摩、羅隆基、蔣廷黻為個案，來分析這群教育背景相似的留美學人，面對民國內憂外患的社會現實時，在思想傾向上徘徊於左右之間的分歧，於社會角色上游走於政學兩界的歧路。文章最終關涉的是這群作為現代中國知識菁英代表的留美學人，在喪失了「上聯廟堂、下接地氣的鄉紳底氣」後，作為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複雜的思想譜系與角色類型（高力克，2013）。

唐海江教授將成舍我對於自由報刊的演變性想像，置於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的緊張關係中進行考量。文章認為類似成舍我這樣的缺乏西學背景的行動者，並非以西方的自由主義為觀照世界的理念框架，相反地

「自由」是牽引他行動的實踐理性；論文旨在從這種考量之中獲取「現代中國自由主義」成長的側面（唐海江，2013）。

李金銓先生以三位著名報人（蕭乾、陸鏗和劉實雁）的生命史為個案，以小見大，探索時代、報館和記者的交光互影，所透視的是中國報業極為核心的三組關係：時代與報社的關係、報社與記者的關係、記者與時代的關係（李金銓，2013b）。

由論文的切入點抵達論文指涉的終極關懷，其間邏輯勾連需要搭建很多「橋樑」。只有在這些「橋樑」環環相扣的基礎上才可能「步步為營」。對於這一點，此二書在個案類文章的分析中提供了眾多極具啟示性的範例。

肆、結論與討論

《文人論政》與《報人報國》二書在問題關懷上關涉了中國報人的「報國情」與「報國路」，揭示了中國近代新聞史的核心義理，對於理解與把握中國近代報刊史的「基體」有著不言自明的意義，可視為中國新聞史最應該有的「讀法」。另外，此二書意在打破學科壁壘，兼收史學、傳播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視野與方法，意在突破傳統的新聞史研究，又的確展現區別於傳統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

此二書的諸多論文以觸碰中國報刊史上生動的人與事，再現人與事背後的複雜性歷史場景見長，且在核心義理上揭示了中國報刊史的基體，並在論題上涵蓋了中國近代報刊的三種基本範式：商業報、專業報和黨報。然而，此二書作為論文集，係合眾人智慧所成，儘管論文集的前身——兩次研討會——均由發起人（論文集的主編）設置了明確的題，並建議參會人圍繞不同主題撰文。但是相關文章終由各個作者圍繞

大的主題，根據各自興趣和研究所長單獨成文。因此，論文集在核心義理上雖呈現著內在的呼應，卻很難如編者所預期「提供新聞史脈絡的整體圖景」。¹⁰

新聞史脈絡的整體圖景中應該有主景，也包括副景；有主旋律，也呈現變奏；應該涵蓋新聞史演化的歷時性邏輯主線，也囊括在這一條邏輯主線背後鮮活的人與事和複雜的歷史場景。過往中國近代新聞史的整體圖景，多由通史類的新聞史著作試圖提供，近代意義的中國新聞史是一段「發生過」的歷史，對於它的書寫，是一種「重現」，更是一種「建構」。每一類撰述作為「歷史書寫」的形式，都必定被加上時代和編者個人的烙印。新聞史的書寫不可能，也不應該「定於一尊」，任何一種新聞史的寫法都有著其存在的意義和價值，也同時很難窮盡新聞史脈絡的整體圖景。伴隨著新史料的發現、新視野的納入和新方法的使用，中國近代新聞史的圖景可能呈現出更多的面相，也會彰顯更豐富的意義。這種面相和意義的不斷「豐富」本身對於洞悉中國新聞史的整體圖景以及推進新聞史的研究都有著不言而喻的意義。

因此，學界所需要的不是「重寫新聞史」，而是呼喚多種類型的新聞史的寫法，尤其需要一方面揭示中國報刊史的「基體」，另一方面又突破傳統新聞史寫法的研究成果。這兩點已毫無疑義地確立了《文人論政》與《報人報國》在當今新聞史研究中卓然的地位，正在這個意義上，這兩本書非常值得一讀！

註釋

- 1 《新聞學研究》已於第 100 期刊登相關書評〈模糊的文人，相異的實踐〉（黃順星，2009）。
- 2 當然，同一作者的有些文章在兩書中也偶有具有前後承接的關係。比如潘光哲教授所著的〈「我們的政治主張」及其紛爭：1920 年代中國「論述社群」交涉互競的個案研究〉（潘光哲，2013），可視為〈胡適與《努力週報》的創辦〉（潘光哲，2008）一文的續篇。黃旦教授與周葉飛博士合著的〈「新型記者」：主體的改造與重塑——延安《解放日報》改版之再考察〉（黃旦、周葉飛，2013），可被視為〈從「不完全黨報」到「完全黨報」——延安《解放日報》改版再審視〉（黃旦，2008）的續篇。
- 3 他將中國知識人對於國事的批判傳統，最早追溯到戰國中期以後齊國所創立了的稷下學宮（余英時，2004，頁 11-14）。
- 4 關於具有近代意義的「國家意識」的產生，比較有代表性的看法認為，近代中國思想史的轉型時期，是一個使「天下」成為「國家」的過程（鄭大華、任菁譯，2000/Levenson, 1964，頁 87）。
- 5 西方的觀念於中國晚清的思想界而言，更多在於其工具理性。史華慈先生曾論述，民主在中國近代思想中只有工具性性質，是達成國家富強的方法，並不重視自由、人權等終極價值（Schwartz, 1964；轉引自黃克武，2013，頁 42）。
- 6 對於這一觀點有相關的爭論，詳見〈「民族」、「民族國家」、「民族主義」的雙重涵義——從葛兆光的《重建「中國」的歷史敘述》談起〉（林同奇，2006）。我們所關注的並不是「中國」究竟在何時形成，而是葛氏的論述脈絡作為一種思考問題的「線索」，對於我們理解中國報人「報國情」的啟發性思考。
- 7 如有論者指出：「由政治而注意報刊，從而認識和研究報刊，幾乎是中國新聞思想不斷發展、豐富的一個最基本的動力」（黃旦，1998，頁 70）。
- 8 金觀濤夫婦曾經分析過傳統紳士的身份認同，認為他們都是文化菁英分子。文化菁英身份的獲得，不是靠倫常關係，而是靠從小飽讀詩書，靠道德修養而得來，這是儒家倫理中心主義中的菁英主義特點（金觀濤、劉青峰，2011，頁 200）。
- 9 葛兆光先生亦言及：來自於「中國」儒家倫理的文明意識從城市擴展到鄉村、從中心擴展到邊緣、從上層擴展到下層，使中國早早就具有了文明的同一性，反過來會成為漢族中國人對歷史回憶、論述空間和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基礎

(葛兆光, 2011, 頁 26)。

10 當然, 這與「論文集」作為撰述的「形式」所附著的特徵亦密切關聯。

參考書目

- 王韜 (1999)。〈論各省會城宜設新報館〉, 張之華 (編), 《中國新聞事業史文選 (公元 724 年-1995 年)》, 頁 14-15。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李仁淵 (2005)。《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 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臺北: 稻鄉出版社。
- 李仁淵 (2007)。〈思想轉型時期的傳播媒介——清末民初的報刊與新式出版業〉, 王汎森 (編), 《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 張灝院士七秩祝壽論文集》, 頁 1-49。臺北: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李金銓 (2008)。〈文人論政: 知識份子與報刊〉, 李金銓 (編), 《文人論政: 知識份子與報刊》, 頁 1-24。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李金銓 (2009)。〈新聞史研究: 「問題」與「理論」〉, 《國際新聞界》, 4: 5-8。
- 李金銓 (2013a)。〈報人情懷與國家想像〉, 李金銓 (編), 《報人報國: 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 頁 1-45。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李金銓 (2013b)。〈記者與時代相遇——以蕭乾、陸鏗、劉實雁為個案〉, 李金銓 (編), 《報人報國: 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 頁 403-464。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李金銓、田波瀾 (2013 年 8 月 7 日)。〈民國知識人辦報以圖重回政治中心〉, 《東方早報》(訪談), B01-02 版。
- 李金銓、燕舞 (2013 年 11 月 1 日)。〈我這代臺灣學人對於歷史多少是有興趣的〉, 《經濟觀察報》(訪談), 第 46 版。
- 余英時 (2004)。《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余英時 (2006)。《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桂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卓南生 (2002)。《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邵志擇 (2012)。《近代中國報刊思想的起源與轉折》。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
- 金觀濤、劉青峰 (2011)。《開放中的變遷: 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北京: 法律出版社。
- 吳恒煒 (1979)。〈《知新報》緣起〉,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 (編), 《中國近代報刊史參考資料 (上冊)》, 頁 267-271。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林同奇 (2006)。〈「民族」、「民族國家」、「民族主義」的雙重涵義——從葛

- 兆光的《重建「中國」的歷史敘述》談起》，《二十一世紀》，94: 116-124。
- 英斂之（1902年6月17日）。〈大公報序〉，《大公報》，第2、3版。
〈時報發刊詞〉（1904年6月12日）。《時報》，第1版。
- 高力克（2013）。〈在自由與國家之間：新月社，獨立社留美學人的歧路〉，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頁112-14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孫軍悅譯（2011）。《作為方法的中國》。上海：三聯書店。（原書：溝口雄三 [1989]。《方法としての中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孫歌（2011）。〈中國如何成為方法〉，孫軍悅（譯）。《作為方法的中國》，頁293-305。上海：三聯書店。（原書：溝口雄三 [1989]。《方法としての中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唐海江（2013）。〈世界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成舍我自由報刊理念的形及其困境〉，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頁189-21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答某新聞記者論報務〉（1903年2月11日）。《大公報》，第2、3版。
- 梁啟超（1979）。〈《國風報》敘例〉，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編），《中國近代報刊史參考資料（下冊）》，頁6-7。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章清（2004）。《「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章清（2013）。〈「公共輿論」與政治：略論近代中國報章成長的曲折〉，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頁465-50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陳兼、陳之宏譯（2013）。《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上海：三聯書店。（原書：P. A. Kuhn. [1999].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黃旦（1998）。〈王韜新聞思想試論〉，《新聞大學》，3: 69-72。
- 黃旦（2000）。〈五四前後新聞思想的再認識〉，《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4: 5-13。
- 黃旦（2008）。〈從「不完全黨報」到「完全黨報」——延安《解放日報》改版再審視〉，李金銓（編），《文人論政：知識份子與報刊》，頁250-280。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黃旦、周葉飛（2013）。〈「新型記者」：主體的改造與重塑——延安《解放日報》改版之再考察〉，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頁325-354。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黃克武（2013）。《近代中國的思潮與人物》。北京：九州出版社。

- 黃順星 (2009)。〈模糊的文人，相異的實踐〉，《新聞學研究》，100: 297-306。
- 楊奎松 (2013)。〈新中國新聞報刊統制機制的形成經過——以建國前後王芸生的「投降」與《大公報》改造為例〉，李金銓 (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頁 355-402。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張詠、李金銓 (2008)。〈密蘇裡新聞教育模式在現代中國的移植——兼論帝國使命：美國實用主義與中國現代化〉，李金銓 (編)，《文人論政：知識份子與報刊》，頁 281-309。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葛兆光 (2011)。《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
- 鄭大華、任菁譯 (2000)。《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原書：J. R. Levenson. [1964].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劉禾 (2008)。《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 (中國：1900-1937)》。上海：三聯書店。
- 潘光哲 (2008)。〈胡適與《努力週報》的創辦〉，李金銓 (編)，《文人論政：知識份子與報刊》，頁 68-94。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潘光哲 (2013)。〈「我們的政治主張」及其紛爭：1920 年代中國「論述社群」交涉互競的個案研究〉，李金銓 (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頁 147-188。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嚴設報律問題〉 (1902 年 11 月 25 日)。《大公報》，第 2 版。
- 羅志田 (2005)。〈近代中國社會權勢的轉移——知識份子的邊緣化與邊緣知識份子的興起〉，許紀霖 (編)，《20 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史論》，頁 128-161。北京：新星出版社。
- 鶴毅 (1905 年 2 月 28 日)。〈論中國書報不能發達之故〉，《東方雜誌》，1: 7。
- Elman, B. A. (2000).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chwartz, B.I. (1964).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